

2013年

中篇小说选粹

段守新 / 主编

中国小说学会 | 名作欣赏杂志 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 · 深度点评

蒋峰 · 《手语者》

方方 · 《涂自强的个人悲哀》

刘鹏燕 · 《红星粮店》

蒋韵 · 《朗霞的西街》

张炜 · 《小爱物》

胡学文 · 《风止步》

戈舟 · 《而黑夜已至》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·····

2013年
中篇小说选粹

段守新 / 主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年中篇小说选粹 / 段守新主编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 - 7 - 5378 - 4073 - 6

I. ①2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2180 号

书 名 2013 年中篇小说选粹

主 编 段守新

责任编辑 史晋鸿

装帧设计 昭惠文化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 - 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010 - 84364428 (北京发行中心)
0351 - 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 - 5628680 010 - 843644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 bywych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1030mm 1/16

字 数 315 千字

印 张 26.5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8 - 4073 - 6

定 价 48.00 元

2013 年中篇小说印象 | 段守新

时光如流，转眼又是一年。在岁尾一如既往，又要盘点和遴选本年度中篇小说的佳作力作。这种工作感觉，很像是渔民在汛期走向瀚海。至于能捞获多大和多少的鱼，既与自身的经验相关，但更在根本上决定于海藏的丰寡与否。对于长篇小说而言，2013 年无疑是个“大年”。一些重要作家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新作，比如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、余华的《第七天》、苏童的《黄雀记》、阎连科的《炸裂志》等等。质量姑且不论，数量已足先声夺人。与之相比，中篇小说创作领域显得似乎波澜不惊，但真正深入到文学现场，却又发现其实不然。有不少作品，就像是生长于地下的根茎类作物，在不露声色之中，奉献出沉实可喜的结果。也正是借着这些有价值的作品，我们得以勘测本年度的文学地形图，已经达到的幅员和海拔，也可以说——它所能达到的疆界和极限。

—

新世纪以降，作家们一个集体性的动作，是向着我们厕身其中的现实生活投入了高度的热情和兴趣。他们的笔力所及，举凡当下普遍而重大的社会问题，诸如民生、教育、环境、官场政治、社会公正等等，靡不毕现。这种凸显“问题意识”，谋求介入乃至“干预”现实的写作趋向，无疑是值得肯定的。在很难为它们找到一个更准确的命名的情况下，我姑且笼统称之为社会写实类小说，以勉力与文学史上声名可疑的“问题小说”相区别，并平复作家和批评家们极有可能出现的不满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似乎文学一旦名之为“问题小说”，就迅速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层级。而实际上，这是一种未经省思的偏见和谬见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的写作瞄准的

是不是某种“现实问题”，而是在于你对它的思考是不是足够洞明、表现是不是足够深切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尊重生活的逻辑，尊重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并能像庖丁解牛一样，批隙导窾，击中它隐秘的心脏和灵魂。一部作品苟能达到这样的内涵和境界，试若还有谁仅仅因为它写了现实问题、现实的矛盾和冲突，而公然蔑视之，那适足以透显贬低者的颠预无知，却丝毫无损于它的荣耀。同样，这一文学尺度，也应成为我们考察当前这些社会写实类小说一个重要的价值指标。

在本年度的中篇小说中，方方的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是一篇受到业内普遍关注的作品。小说甫一发表，旋即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。正像他的名字所喻示的，主人公涂自强，这个出身寒苦的农村大学生，为改变命运而苦苦奋斗的短暂人生，事实上不过是徒然地“自强”。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，像他这样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源，甚至也没有出众的外形条件的普通底层青年，向着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。小说在整体上所使用的，是一种闭合的回环的结构——从主人公带着父老乡亲的希冀走出深山踏上求学之旅开篇，而以他五年后拖着绝症的身躯重返故园之路收笔——无疑，这是对涂自强黯淡无望的命运的形式强化。正像处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，来自城市优越家庭的赵同学最后所总结的：“他从未松懈，却也从未得到。”也可以说，他原本是一无所有，而最终也一无所获——但这样说似乎又不准确，毕竟，走在末路的涂自强背上多了一具观音菩萨像。但这与其说是代表着作家方方的同情，不如说是一种隐微的反讽。这个为民间大众广泛信仰的神灵，虽然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，但她对于淹没在人世苦海的涂自强，同样无动于衷无能为力。

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，方方所塑造的涂自强，与路遥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、刘震云《一地鸡毛》中的小林等等人物一脉相承，均可归为农村知识青年奋斗者的文学谱系。如果说，高加林在青云直上时突然一落千丈的人

生，恰可以反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中国，“知识(确实)改变命运”这一命题；而作为公务员的小林，虽然在城市有着“居大不易”的困窘，但尚能勉强立足，因此大致称得上“知识多少改变命运”；那么，到了新世纪，涂自强的个人奋斗的悲剧，则凿凿确证“知识很难改变命运”。尽管他已经将人生理想放得很低，不再具有高加林、小林那样的价值实现或精神空间的追求，也尽管方方不无理想化地给他提供了一个温暖和谐的人际小环境，但这些仍然无助于涂自强人生命运的改善。转型期社会的阶层固化，向着自强不息的涂自强们关闭了大门。“不同的路 /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/ 不同的脚 /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”，这当然不只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，而是一个广大阶层的集体悲伤。它不只包括涂自强这样的农村出身的大学生，也包括所有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弱势群体或者草根阶层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《悲伤》深深触动也触痛了我们的心，因而，有着重要的社会认知和现实批判的价值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篇小说在叙事艺术的层面，却无法与其重要的主题价值并驾齐驱，相得益彰。甚至可以说，在相当程度不是提升而是拉低了它的整体文学成就。这些艺术性的缺憾，尤以在情节设计上的过于刻意化最为突出，比如为了获得某种“力度”，而在主人公的身上不断堆积各种苦难筹码，以及既戏剧化又俗套化的绝症结局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而这些艺术问题，应该既与作家本人的经验范畴，也与她的某种虚浮的创作心态有关。说到底，方方写起来真正游刃有余的，是那个热烘烘的武汉市民世界。对涂自强这类出身农村的大学生，她尽管出于热切的现实关怀，渴望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，但终究总是隔膜，以致她的书写，还是不免流于人为化、浅表化和公识化。

与之相较，胡学文的《风止步》受到的重视度也许不够，但却是一篇能够穿透现实生活具象，而能掘进历史文化的沉积层的力作。小说通过一个

农村留守儿童的性侵事件，着意呈现和剖析的，其实是深植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肌理中的一个文化痼疾，即男权中心文化中陈腐而横暴的“贞节观”，及其所导致的恶果。王美花之所以在孙女燕燕被马秃子侵害后选择隐忍沉默，不仅没有将这恶棍绳之于法，反而遭到了他变本加厉的玷污和勒索，正是源于她的一种深深恐惧——假如这个事件被揭露，燕燕的名节也将被毁，她的一生都要蒙上巨大的阴影。也正是为此，当吴丁找上门来，希望她能说出真相，以惩治罪犯的时候，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和抗拒，甚至最后杀死了他。然而，我们与其指责这个农村妇女的愚昧无知，毋宁进而追思她背后那种无形而强大的文化观念。因为，说到底，她不过是被这种恶劣的男权文化所挟持和驯化的一个人质，同时，也是一个受害者。小说以隐约的信息暗示我们，王美花在年轻时，可能也有过燕燕这样的伤害，以致她常常遭受丈夫的家暴。的确，假如这种有毒的文化情境不能彻底地予以改造，那么我们就无法阻止受伤害的女性，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，而选择讳莫如深，而选择沉默不语。农村妇女如王美花只能如此，而城市女性如吴丁的女友，也只能如此。

吴丁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，所代表的是具有现代思想的启蒙者角色。尽管他在城市的生存艰难困窘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决绝的勇气和毅力，投身到为受伤害的女性伸张正义的道路。也许在最初，他的动机来自于私人性的灵魂救赎。但在客观上，还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。然而，在作者笔下，他并未像通常启蒙叙事里的文化英雄那样，被赋予足够强大的拯救和感召力，而是处处显示出一种柔弱的姿态。在这个积重难返的社会文化空间，他遭遇了普遍性的冷漠、嘲笑、误解、质疑和排斥。尽管他左冲右突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他的启蒙效果却微乎其微，包括现女友也离开了他。最后，他甚至为此而丧命。作者对启蒙的现实命运的忧虑，对文化蒙昧的愚顽性的感愤，难以尽言。

当然，从其他的角度，我们也可以读出更复杂的寓言意味。比如，启蒙者/被启蒙者之间到底应是何种关系？启蒙如何才能有效？启蒙的目的正义性是否可以替代和覆盖方式的不当性？启蒙者的权利从何而来？又该具备何种资质？还有，在一个文化结构并未根本变动的前提下，他又该如何应对启蒙有可能产生的其他后果？这些问题，从鲁迅开始，一直都在紧张思考，却也一直没有完满的解答和解决。我们期望《风止步》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，显然并不现实。但作为后之来者，它对这一文学传统和这些思想命题的赓续，已足以赢得我们的致敬。

而曹军庆的《滴血一剑》，围绕一个高中生的出走事件，从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方面，集中探讨了作为当前社会热点之一的教育问题。我们看到，在这多重合力下，教育在如何严重地偏离正轨。其一，学校不仅不再是净土，反而成了“最势利的地方”，唯分数是尚，唯利益至上。成绩高/低，成为鉴定学生好/坏的唯一标准。而拼命抢夺、讨好“好学生”，以及将“坏学生”树为“反面典型”，毫不顾忌其自尊心地予以贬损，则成为教师的主要手段，成为可复制的成功经验。其二，是那些身在底层的家庭，也将全家的未来悉数押注在孩子的身上。考高分，上好大学，日后将父母“拔出人生沼泽”，是他们对孩子的全部要求。其三，小说尽管没有正面展开，但通过学校、家庭的孔道，仍间接传递出一定量的社会现实信息，如官、学、商的相互勾结，利益交易，贫富差距，社会不公等等。这种唯实唯利的污浊不堪的大环境，必然造成学生身心的严重压抑和扭曲。白令涛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了自己的老师，以及在欧阳的暗中组织下几千名学生撕书的行动，正是学生与教师、学校之间长期积聚的矛盾，一个个极端化的结果。而这些，也促使一直是“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典范”的单立人，开始反思自己的学习和生活，“现在才发现，他不是为自己读书。他在为父母读，为老师读，也为学校读。上课，去学校变得好生无趣。毫

无意义”。继而，他离家出走。如果说，这原还不过是一次对固有生活轨道的随意性逸出，那么他到后来，却是出于有意的叛逆、自我放任，遁身于网吧，沉溺于游戏，宛如人间蒸发。

除了对教育问题的聚焦，小说也触及当前的家庭问题。这主要体现于单立人父母所构成的次故事线。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，他们的夫妻感情早已变得相当淡漠。独生子女的“出人头地”，是维系着他们脆弱的家庭关系的救命稻草。一旦失去，他们也就分崩离析。而在绝望之中，平时内心里努力抑制着的那些怨毒和粗暴，更是喷薄而出，“争吵，辱骂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。为了加大杀伤力，相互揭疮疤”。人性的丑陋面呈露无遗。小说像一只显微镜，也像是一把柳叶刀，在单家这样一个堪称当前中国无数家庭的缩影的典型结构里，将它所藏纳的重重问题，抉剔得筋络毕现，更解剖得血肉淋漓，让我们瞠目结舌，也动魄惊心。

二

苏珊·桑塔格在《作为疾病的隐喻》一书中，曾经专门探讨了一些疾病（诸如结核病、艾滋病、癌症等），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，从“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”，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，又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。她特别指出，写作本书的目的，正是“为了揭示这些隐喻，并借此摆脱这些隐喻”。然而，这似乎并不能阻止我们有不少作家，仍然坚持从医学领域借喻，以传达他们对现代人生存的种种观察和感受：意义的丧失，精神的危机，道德伦理的震荡，以及灵魂和人性深处的暧昧不明。这或许与他们的视点，主要集聚于人的内在世界有关；也或许与他们对现代人的精神状况，一些基本的判断有关。总的来看，在他们的笔下——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写实还是隐喻——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，往往呈现出某种“病态”的指征。此外值得提及的是，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，似乎也并不留心

于和书写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而是常常表现出一种情感移注的迹象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与那些社会写实类作家有明显的差异。能使他们真正起共鸣的，或许不是桑塔格的告诫，而是法国作家让·科克托的这一告白，“其实我们都是病人，我们只不过需要一个对病情的诊断。”

像许多 70 后作家一样，弋舟专注并擅长于书写城市生活，传达现代体验。在新作《而黑夜已至》中，“抑郁症”，被诊断为一种时代病，得到细致地审视和呈现。作为重度抑郁症患者，主人公习惯于每晚在同一个时间段，同一个角度，用手机拍摄同一个立交桥，并将照片配以“而黑夜已至”的相同文字发到微博上。这或许并没有特别的意义，正像他说的，“我只是喜欢这种绝对感，它有种单纯而稳定的特质”。但这也可能反向泄露出，他正在经历的或许恰恰是某种与之相背的生存感——不稳定性，暧昧，混乱，虚空、离散化，无意义等等——以及他对它们的恐惧和力图抗拒。而事实上的确如此，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生存情境，也是“我”们在这个时代真切的生存体验。在小说中，主人公兼叙事人的“我”，其实是被作为一颗“现代灵魂”而予以集中刻画。他的身上，发散着太多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人的气味，或者气质：对欲望几乎毫无抵抗力的服从，高度的手机或网络依赖，对现实世界的冷漠和疏离，以及注意力减退、自我评价降低、躁狂、焦虑，情绪低落、罪恶感、自杀冲动等等——而现在，这些已经统统被划入抑郁症的庞大领地。抑郁症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和成为“时代症”“现代病”的隐喻。

小说的主体构架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在我看来，它固然增加了小说的故事性，但这故事本身或许并不特别重要。它的意义更多在于，通过所谓的“六人定律”，一方面，它使主人公发现了他生活的世界一个群体性的精神隐秘，即在这个败坏的时代，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抑郁。在根本上，“抑郁”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瘟疫、一种情绪传染病。而另一方面，

它也使他进而发现，尽管他们曾经沉溺在欲望的漩涡，犯下过失，并因此抑郁，“可是，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，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。”正是这种自罪自疚，才使人向善向美的灵魂救赎成为可能，或者像作者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，“除了让人在歧途上屡败屡战，或者也从根本上保障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彻底崩盘。”（《重拾纯洁的碎片》）这种对人、人生、灵与肉的重新理解，成为他决心走出抑郁，“迎接黎明将近”的理由。只是，由于作者处理的失当，主人公精神的新生在结尾来得不免有些突兀和生硬。同时，作者也没有为他的人物，提供一个清晰而坚定的方向或目标。这使他的精神更新因为缺乏有力的价值引导，而变得虚泛可疑，一如他最后拍下的那张没有聚焦，只是“一片灰白的虚空”的照片。

对弋舟式的现代人通过“堕落—救赎”的灵魂淬炼重获新生的精神图示，鲁敏似乎并不确信。在《0房租》里，她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异常惨淡无望的生存图景：孤独、枯寂的，生活完全停留在过去的“失独”老人。感情遭背叛，工作不如意，毫无存在感的“蚁族”女大学生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都是没有未来的人，所谓人生，也是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余生。然而，他们尽管都在承受着生存的煎熬，也尽管居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却不能为对方提供多少精神的慰抚。而且，似乎不仅是无力，更多的是无意和无心——因为他们的心思，已都凝注在对死的向往上。小说当然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，比如“独生子”政策给各个家庭带来的高风险，给予一代带来的过于沉重的责任，以及他们艰辛窘迫的生存状况，但是，它的叙事重心，显然还是放在表现现代人心灵的苦闷、绝望和隔膜，即“哀莫大于心死”。或者一言以蔽之，“生又何欢，死又何难”的厌世情绪，成为作家们对现代精神症候的又一个诊断。

这种现代人的孤独和隔膜，在孙频的《异香》里，又被转放到一对男女

登山客的身上。即使是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，即便因为条件所限，这对孤男寡女挤在同一个睡袋或同一张床上，身体如此紧密地贴在一起，“一个嵌在另一个的臂弯里”，但他们的心却仍然是孤独和隔阂的，充满着警惕和猜忌、试探和闪避、算计和博弈。现代人似乎从根本上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，失去了通过交流和信任，而获得温暖和慰藉的任何可能。与之构成强烈对照的，则是山中那对老夫妇穿越阴阳两隔的感情。他们活得清贫，但也活得简单和纯粹，相濡以沫，以致真正的生死不离——在丈夫死后，老妇和她的儿子因为眷眷不舍，用药物将他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，以永远陪伴家人。小说里那股萦回缭绕在字里行间的“异香”，就是这种神秘的药物所产生的气味。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，它固然有渲染气氛，挑逗读者期待的功能，但更重要的意义，还是在于象征着一种现代都市业已罕见的、朴素而坚定的感情。

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病况，《0 房租》《异香》分别放在年龄结构(老/少)、性别结构(男/女)中加以观察，而马晓丽的《催眠》，则直接将之放在医生/病人的医学结构。故事的大背景与“汶川大地震”的创伤记忆相关，但不同于那种“大灾面前有大爱”的主流化叙事，作家围绕一个失眠症的治疗问题，通过心理医生、作家和排长的多番对话，以抽丝剥茧的方式，意在逼视、拷问现代人的灵魂隐秘。在内心良知的逼促，以及他人的引导和影响下，故事中人逐一鼓足勇气，艰难地说出各自曾经使灵魂蒙污的一面。与那些“大地震”的正能量叙事相比，《催眠》对人的灵魂的“深”与“真”的探索，着实达到了相当惊心动魄的程度。然而，小说借医生之口指出，其实这仍没有到底，因为“能袒露出来的都不是你最不能示人的东西”，或者说，“不可能有彻底的袒露”。而这就是——人性。可以说，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，以及扶幽剔微地呈现，使它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而与此同时，小说还向我们展示出，故事中人之所以做下违心的事，

除了出于对个人私利的追逐，还包括一种“环境催眠”，即体制对于个体的管控和规训。他们无一例外要面对的，是一套“自行运转的机关程序”，而个人是捆绑在其上的“软件”，除了接受、执行它的指令，几乎很难有其他的选择，因为他很难承受其他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“催眠”，它所要求和塑造的，也必然是一种“单向度的人”（马尔库塞语）。而这，也几乎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真实镜像。不夸张地说，《催眠》对现代人的根本处境的揭示，丝毫不逊色于它对人性的深度透视。

作为一篇讲述青春的疼痛和成长的小说，蒋峰的《手语者》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。王朔式的放浪而纯情的青春故事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式的玩世不恭，甚至粗口化的叙述腔调，以及好莱坞大片《亡命天涯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等的情节和桥段，在它的里面都可以找见。因此，它注定是一篇相当好读的小说。作家将主人公的成长，始终放在强度的精神情感震荡中，沿着两条故事线而展开。一条写父子亲情，容纳犯罪、金钱、越狱、逃亡等传奇因素。一条写男女爱情，又曲尽爱欲痴缠、悲欢离合的都市言情。但是，写一个精彩而刺激的通俗故事，并不是蒋峰的本意。据他的自述，他希望《手语者》讲述的，其实是一个有关“信仰和梦想”的主题。很显然，哑巴继父所牵动的故事线，因为过于戏剧性和类型化，无法承担这一任务。因此，他补写了谭欣的故事线，用以调整叙事节奏，落实叙事主题，并将小说尽可能拉回日常生活的现场。——这的确是小说里最有价值的部位。流利的叙述，俏皮生动的对话，以及对现代都市青年情爱心理的准确把握，显示出蒋峰作为一个好作家的能力和特质。而关于信仰的主题，被兑现为许佳明从此前“活得跟行尸走肉一般，没理想，没方向”，到后来则转变成一个敬畏并醉心于艺术的艺术家的艺术家。这里面，是作为前女友的谭欣，以她对“崇高与美”的疯狂偏执的追求，深重地影响了他。起初他也

许只是刺激和负气，以后则是心悦诚服地真正认同。但是，这一精神转化的过程，小说因为缺少细致而有力的刻画，却明显缺乏说服力。而继父于勒的人生传奇，自始至终也以孤立和游离的形态，无法圆满地融汇于小说的整体精神走向。此外，小说中的一些理念，也无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质疑。比如，幸福是否真的如谭欣所言，只是一种庸人的体验？而在追求“崇高与美”的名义下，她的那些也许并不“崇高与美”的作为就有了被谅解的理由？再比如，于勒在越狱和逃亡过程中的冷血杀戮，又是否真的可以在“他根本没犯法，所以不伏法”的逻辑下获得合法性？我们如何面对那四个警察的血？甚至包括，他是否真的可以代替法律杀死那三个死刑犯——即使他们真的该杀？不能简单地托辞为，这些只是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或言语，而也应同时注意到，作者对他笔下这些人物所表现出的情感和态度。不能不说，上述艺术和理念上的问题，导致《手语者》的整体成绩有所折扣。

三

历史叙事虽然是新世纪文学写实主线之外的支线，但与之相比，它的文学价值和成就毫不逊色。在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上，它固然与传统的历史小说，以及正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相去甚远，但诸如先锋作家的后现代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和态度，却也同样敬谢不敏。大致来看，新世纪历史叙事不同于以往的地方：一是在时间的选择上，从古代史、民国史，明显向着共和国初史（如“反右”“大饥荒”“文革”等等）做更多倾斜。二是在“怎么写”的问题上，拒绝游戏化，拒绝过度的情绪渗透，也拒绝华丽的炫技表演。而沉着、冷静乃至冷峻的态度，朴素、直接然而有效的形式，成为作家们一个基本趋同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。他们就像是在幽暗的时空隧洞锐意前行的持灯者，引领我们看到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——血与泪，铁

与火，生命的坚韧与劫毁，人性的沉落和飞扬。

蒋韵的《朗霞的西街》，是今年历史书写类小说一个重要的收获。对历史的追溯和辨识，更多建立在虚构和想象的基础之上。小说的叙述语言，浸透浓浓的诗性，宛如一条平静和缓的清流，在古城旧宅的风物人事之间，低徊盘桓。蒋韵温婉惆怅的追念情怀，不难得见。但是，这一切，最终随着一个惊天秘密的乍然现身，而陡然翻转。平素娴静贞淑的马兰花，在天地玄黄的大时代（“镇反”），竟将曾任国民党营长的丈夫陈宝印，多年隐藏在自家后院的地窖里，才是这故事真正的黑暗漩涡。其时五洲风雷激荡，革命的天罗地网纲举目张，恢而不漏，正所谓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。马兰花此举，自然是在“开历史的倒车”。这对同命鸳鸯，旋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，化为齑粉。而故事里最令人惊悚不安的部位，是在革命的灼灼光照之下，作为昔日的政治对手，陈宝印不能见容于人世，只能遁入地底，昼伏而夜出。八年之久，竟然遍体生出白毛。以致女儿朗霞在惊见之余，视作幽魂鬼魅。这里，蒋韵仿用西方哥特小说古宅魅影的情节模式，固然来路可见，但在深层指涉上，其实更隐含着与革命文艺经典叙事的一次遥相对话。作为此类叙事的“样板”，《白毛女》“旧社会将人变成鬼，新社会将鬼变成人”的故事和阐释，我们耳濡目染，何尝或忘。而蒋韵却以一种反向性写作，重塑历史图景，传递人道关怀。小说交代，陈宝印本有机会败退台湾，只因抛不下妻女，而毅然舍生赴死，重蹈不测之地。同样，马兰花虽然不乏追求者，但在新时代的暴风骤雨中，却甘愿牺牲青春和生命，做“旧时代的守墓人”。大公无私，大义灭亲，本是最重要的革命义理之一。而在《西街》里，蒋韵则着意强调，人性话语对政治话语的颀颀，或者超越。她写历史的暴虐不仁，更写爱的力量深厚强韧，乃至可以置死生于度外。

在小说里，赵彼得医生虽然着墨不多，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。

他原是马兰花的追求者，因为感佩于她的节操和奇行，在她家发生变故之后，居然能多年如一日，偷偷资助朗霞的生活。这是朗霞在饱经家破人亡的创痛、阅尽世态炎凉和人心翻覆之后，最后的一点信念之光。正像多年之后，朗霞在赵医生墓前的深情告白所言，“在我最痛苦最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在我想做坏事想做恶事想做狠毒的事想堕落的时候”，他成了让她不作恶的“那个理由”。虽然小说没有明言，但赵彼得医生的名字以及来自教会医院的背景，却使我们意识到，他所代表的，是来自宗教的爱的精神。或许在蒋韵看来，这是真正能够慰抚历史苦难，化解人间暴戾和仇怨的终极价值。

把《红星粮店》纳入历史叙事的框架，我一度颇费踌躇。毕竟，小说所处理的故事时间——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当下的社会状况——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展开过程，并没有彻底完结，而是仍在纷纭变动，充满着不确定性。但是，如果从个体的人的角度着眼，以叙事者小丁为代表的一代人，却在时光流转之中，早已从起初的青春懵懂，悄然命途不惑。无论是回顾还是前瞻，他们“腐朽的下半生”，命运线基本清晰定型。因此，在这特别的人生节点，追忆、反思自我的成长或挫败，正其宜也。而人又从来都是历史的人，与某种既定的历史情境有着血肉相连的关联，因此，对个人史的书写，也总是不可避免牵连出一段大历史，哪怕只是它的一些梗概或脉络、一些散碎的声色光影。主人公小丁以他的人生际遇，见证的正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，像红星粮店这样的“国企”，一部兴衰沉浮的大历史。而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具体的成败得失，并不亟亟于心。相反，她更多瞩目于这变动不居的大时代，小人物的情感、体验，以及生存方式的个人选择。尽管面对着红星粮店日益败落的现实，尽管自己也并非毫无选择（比如升迁的机会），但小丁并不像其他职工那样纷纷另谋出路，而是始终和红星粮店坚守在一起，直至它最后彻底关闭。或

许在许多人看来，小丁的这一行为，实属冥顽不化。然而，究其实，小丁不是衣食丰厚的既得利益者，也不是毫无能力，只能寄生于旧体制的废材。他之所以与粮店不舍不弃，是因为对他来说——也许并不是在显明的自我意识层面——粮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糊口的“饭碗”，而是作为一种复杂的情感贯注的有机体，融于他的生命，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。那里贮藏着他有关于青春、爱情、感恩、内疚、荣誉、归属感等等重要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。在他心灵的天平上，这些，无疑比我们这个时代所奉行的“成功”标准更为珍贵。在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之下，一个个体也有不选择“与时俱进”的权利。这无关乎“正确”与否，同样不必诉诸所谓“成功”的核查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主人公的坚持应该得到我们尊重。而作家写改革开放的大历史，能够绕开各种主流话语的覆压，不简单化地吹鼓改革改天换地的神奇伟力和愿景，不蒙昧化地强打精神号召“分享艰难”，也不苦情化地渲染苦难不堪的底层生存，而是专注于对时代和人心的独到观察和重新解码，这种努力，同样值得我们尊重。

四

本文拟以对陈河的《獠》、张炜的《小爱物》的讨论作结。这两篇作品，一个写人与动物的故事，一个写人与“异物”的故事。它们共同观照的，是人与非人、异类或曰异质性存在的关系。上面提及的诸作品，无论写现实还是历史、城市还是乡村、社会还是人性，其实概而言之，都是对人本身的生存境况的某种关怀。在在体现的，是以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。与之相比，《獠》与《小爱物》，在视景上有明显的偏移和拓展。进一步说，它们力图摆脱的，恰恰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，而企望在生态诗学、生命诗学的视域内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为人的存在情境，做出新的理解或诠释。